

马来西亚的中文传承与传播

王晓梅*

摘要

中文随着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移民传播到南洋，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 方言传承阶段；(2) 方言为主、华语为辅的传承阶段；(3) 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传承阶段。中文的传承路径在各个阶段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方言时期主要依赖家庭、会馆、私塾等；第二阶段新式学校、华文报纸等成为新兴的传承路径；第三阶段除了华文学校、华文媒体、社区、家庭等传承路径外，互联网、新媒体等也有助于华语言的传承。中文不仅在马来西亚得到了维护，而且也发展出自身的特点。早期方言（尤其是闽南话）与马来语接触，产生了混合语峇峇马来语、檳城福建话、吉兰丹福建话等；华语经过本土化的发展，逐渐形成马来西亚华语，在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的华语变体，成为全球华语的重要一员。随着国民学校开办华语班、非华裔入读华文小学，以及孔子学院在马来西亚的创办，中文的传播又呈现新局面。中文向更多非华裔传播，使中文在马来西亚形成传承与传播两条线路，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关键词：中文传承，传承路径，中文传播，语言接触，马来西亚华语

* 王晓梅，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院聘研究员。联络电邮：xmwang@xmu.edu.my。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21FYYB009）的支持，也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科研基金（XMUMRF/2023-C12/IART/0019）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中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史与华人移民史紧密相连，其后期发展又与中国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和简体字的推行、现代汉语标准的确立等息息相关。随着近年来全球华语研究的兴起，学界开始关注马来西亚华语及其特点。2016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设立了马来西亚组，2022年《全球华语语法·马来西亚卷》出版，2022年《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在马来西亚出版。与此同时，有关马来西亚华语的起源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展开，如徐威雄（2012，2020）对十九世纪末到战前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学界开始探讨马来西亚华语的发展分期，例如潘碧丝（2007）的“四期说1”¹，徐祎（2018）的“四期说2”²，王晓梅（2023）的“新四期说”³等。然而，学界缺乏从宏观角度对中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缺乏将方言与华语统筹处理的视角。郭熙、雷朔（2022）在谈到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时呼吁要加强华语发展史、华语传播史和华语传承生态学研究。因此，本文采用“中文”这个术语，兼顾方言与华语，从历时的视角梳理其在南洋⁴的传承、传播与发展。语言传承多指纵向的代际传递，而语言传播一般指横向的语言使用域扩张、使用人口增加等（Cooper，1982），近年来更特指语言在不同国家、族群间的扩散。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将中文的传承划分为三个阶段；然后介绍每个阶段的传承路径；其次指出中文在马来西亚的演变与特点；最后简要指出中文传播的新趋势。

1 其四期为：1、19世纪末的文言文阶段；2、20世纪初的白话文阶段；3、1966年到1982年受台湾“国语”影响阶段；4、1983年至今受普通话影响阶段。

2 其四期为：1、19世纪末以前的汉语方言期；2、1900-1919年华语萌芽期；3、1920-1941年华语成长期；4、1947年至今华语成熟期。

3 其四期为：1、19世纪中到1919年的萌芽期；2、1920到1945年的发展期；3、1946到1982年的成长期；4、1983至今的成熟期。

4 地域指称因政治发展而不断变化，本文主要关注马来西亚的情况，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时期也用“南洋”“马来亚”等概念，文中不再作说明。

二、中文在马来西亚的三个传承阶段

中文随华人移民南来，在南洋不断传播。其传播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方言传承阶段；方言为主、华语为辅的传承阶段；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传承阶段。以下分别说明。

（一）方言传承阶段（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

早期福建、广东等地华人移民将祖籍地方言带到南洋，影响较大的方言有闽南方言（福建话）、粤方言（广东话）、客方言等。“迟至十九世纪末，南洋基本上还是个方言群的社会”（徐威雄，2012，页 91）。1911 年英殖民政府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福建人是最大的方言群（25.8%），客家人其次，占比 25.2%，广东人是第三大方言群（23.6%）。各方言群通常聚居在一起，守望相助。

表一：1911 年人口普查的方言群分布

	福建人	客家人	广东人	潮州人	海南人	其他	总计
1911 年	25.8%	25.2%	23.6%	10.0%	7.6%	5.2%	100%

注：钟临杰 1998 西马华族人口变迁，林水豪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页 197-134。吉隆坡：中华大会堂。

各大方言群通过设立会馆、学校等方式维护各自的利益、传承各自的方言。早期各“帮”之间缺乏共同语，时有摩擦，甚至有械斗。根据 Isabella Bird 1879 年的记录，当时霹雳太平的矿场流行五大华人方言，由于彼此缺乏共同语，只能以马来语作为沟通语（Chong, 2004, p. 51）。十九世纪中后期，华人社会开始出现族群整合的趋势，会馆、庙宇、学校、商会等的跨方言群合作不断出现（徐威雄，2012）。根据零星的记录，南洋各地较为通行的方言有闽南话（福建话）、粤语（广东话）、客家话等。

方言传承阶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华语开始在南洋传播。即使华语借由新式学校开始介绍到华人社会，但华语的使用非常有限，社会上流行的仍是各大方言。

(二) 方言为主、华语为辅的传承阶段(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初, 新式学校开始创办, 教学媒介语逐渐改为华语。1904 年檳城中华学校创办, 教授“国语”正音(廖文辉, 2018)。另外一个趋势是方言学校转型或多间方言私塾合并为新式学校, “教育整合运动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徐威雄, 2012, 頁 111)。华语在教育领域得以推广, 但是社会各领域华语的使用仍然受限(徐威雄, 2020)。据 1970 年人口普查, 41% 的马来西亚华人会说华语(Wang, 2012)。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除了华文学校推广华语之外, 各类民间文教机构如夜学班、传习班、补习班也积极教授华语(徐威雄, 2020)。1980 年, 吉隆坡、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成立“雪隆推广华语工委会”⁵, 开始大力推广华语。该工委会通过举办座谈会、组织华语演讲比赛、华语辩论赛、谱写“多讲华语”歌曲等大力推广华语。“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口号通过丽的呼声电台传遍大街小巷。

国语(华语)受到华人社会的欢迎, 主要是因为解决了各方言群之间的交流问题, 成为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因此华语能很快地在学校推广开来, 并逐渐推行到社会上。徐威雄(2020, 頁 111)借由各类材料推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的南洋, “国语已经是相当成功地普及开来了”。

不过, 这一时期, 社会面上仍通行方言, 形成华语与方言并用的双层语言现象。华语主要应用于学校、媒体等正式场合, 而方言主要用于家庭、社区等非正式场合, 形成双言制。

(三) 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传承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1983 年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开始教授汉语拼音和简体字, 90 年代开始政府允许国人前往中国留学, 这些因素都促使华语进一步在马来西亚推广开来, 是华语的成熟期(王晓梅, 2023)。华人的华语能力进一步加强, 华语的使用领域逐渐增多。我们在 21 世纪初调查了

5 该工委会的资料详见 <https://historygallery.chinesechamber.org.my/cn/speak-mandarin-campaign/>

全马五个地区 5433 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王晓梅，2026）。结果发现各地学生基本以华语为第一语言（参见表二），柔佛州最高，82.8% 的学生以华语为第一语言，其次是雪兰莪州 43.9%，霹雳州和吉隆坡的比例接近，分别是 39.7% 和 35.8%。只有檳城例外，当地的福建话仍然是强势方言，41.6% 的学生以福建话为第一语言，38.2% 的学生以华语为第一语言。此外，广东话也是吉隆坡和霹雳州的强势方言，分别有 33.7% 和 30.2% 的学生以广东话为第一语言。这个调查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华语和方言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已经发展到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阶段，目前的年轻一代华人很多已经失去了方言能力，而成为“华语人”了。

表二：五个地区独中学生学会的第一种语言（%）

	吉隆坡	雪兰莪州	檳城州	霹雳州	柔佛州
华语	35.8	43.9	38.2	39.7	82.8
福建话	5.9	23.7	41.6	13.3	5.9
客家话	9.1	3.7	2.0	7.5	1.5
广东话	33.7	11.7	6.7	30.2	2.6
其他	15.4	17.0	11.5	9.3	7.2
总计	100%(784 ⁶)	100%(674)	100%(811)	100%(1528)	100%(1636)

我们在柔佛州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华语已经是社会上普遍使用的语言（Wang, 2012）。此项研究调查了新山、峇株巴辖、居銮、麻坡四地公共场所的商业用语，如巴刹、夜市、小贩中心、商场等，观察了 102 位店家与顾客之间的 201 次互动，华语的使用占 70% 左右，福建话占比 20% 左右。这说明柔佛州的华人社会已经是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情况了。

“华语为主、方言为辅”既体现在家庭域，也体现在其他公共领域，说明中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基本实现了“华语化”，方言基本退出了多数语言使用域。一些传统的强势方言区，如吉隆坡、檳城等

6 括号内为总调查人数。

地，年轻人也是以华语为主要语言，方言为辅助语言。

三、中文的传承路径

（一）第一阶段方言时期主要依赖会馆、私塾等

如前所述，早期华人移民聚族而居，为保障共同利益，纷纷成立会馆等组织。马来西亚最早的会馆是1801年檳城成立的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廖文辉，2018）。会馆往往又修建庙宇、开设私塾、设立义山等，形成多元的民间信仰系统、不同方言媒介的教育体系、以及处理身后事的殡葬服务。关于最早的私塾，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1815年马六甲已经有三间私塾，另一说认为1819年檳城的五福书院是最早的私塾（廖文辉，2018，頁316）。这些早期的私塾都是以方言授课，且附设在不同会馆之下的私塾以不同的方言为教学媒介语。根据海峡殖民地1884年的统计，海峡殖民地共有115间华校（陈绿漪，1984）。这些早期的华校、会馆在方言的维护与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第二阶段新式学校、华文报纸、华人社团等成为华语传承的新兴途径

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华语逐渐在南洋社会传播开来。华文学校在华语传承与传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较早的华文学校有：1904年创办的檳城中华学校，1906年创办的吉隆坡尊孔学校、1907年创办的怡保育才学校等（陈绿漪，1984）。这些新式华校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本实现了从方言到华语的过渡，课本也改用白话文（陈绿漪，1984，頁287）。当时也出现华校合并或合办的趋势，各方言群打破边界、走向合作，进而会馆办学也走入了历史（徐威雄，2020）。

1957年，马来亚独立，华文小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61年《教育法令》颁布，政府停止向华文中学提供津贴，引发华校改制。接受改制的学校成为国民型中学（钟灵中学等54所），目前共78所华中；

拒绝改制的学校成为华文独立中学（宽柔中学等 16 所），目前共 60+2 所独中。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采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对于华语的传播至关重要。

华文报纸的创办也有助于华文的传播。较早的报纸包括：1910 年创办的《光华日报》、1923 年创办的《南洋商报》、1929 年创办的《星洲日报》等。这些华文报纸在华人社会颇受欢迎，与华文学校一起承担起维系华语文使用的重任。

华人社团也是华语传播的推手。前文提及的吉隆坡、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1980 年所成立的“雪隆推广华语工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三）第三阶段除了华文学校、华文媒体、社区、家庭等传承途径外，互联网、新媒体等也有助于华语的传承

这一阶段，华文学校依然是华语传承的主要路径。据统计，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共 1,301 所，2021 年学生人数共 505,513 人；华文独立中学 2022 年学生总数共 79,694 人；国民型华文中学 2011 年学生人数共 122,020 人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空间也成为华语传承的重要路径。传统媒体如华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都设立了网络版或者新媒体账号（如脸书、Instagram 等）。例如，马来西亚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的电子报的阅读率 2022 年达 200 万人，而其纸质版订户从 40 万下滑至 16 万⁸。这说明新时代华语的传承也依赖新媒体，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群体中间的传播。

四、中文在马来西亚的演变与特点

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传到南洋之后，在语言接触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异。例如邵宜、冼伟国（2004）通过调查，得出吉

7 数据来源：<https://resource.dongzong.my/literature-n-information/education-statistics>

8 参见报道 <https://sempilan.sinchew.com.my/news/20220523/sempilan/3819554>

隆坡粤语的阳上调并入阴去调，从而调类减少到 8 个。翁慧珊（2014）则调查了怡保市的粤语，提出其声调进一步简化为 7 个，除了阳上与阴去合并之外，阳去和阳平也无法区分。可见，方言演变的总体趋势是简化，尤其是声调的合并。除此之外，早期闽南话与当地语言接触，形成了新的混合语言，如峇峇马来语、吉兰丹福建话等。马来西亚华语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以下分别介绍。

（一）早期方言与马来语的接触

早期闽南方言与马来语深度接触之后形成混合型语言，以吉兰丹福建话和马六甲峇峇马来语为代表。

吉兰丹最早的华人移民可以回溯到 13 世纪，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福建省，与当地马来人、泰国人通婚，形成土生华人社群（peranakan Chinese），目前人口大约有两万人，占吉兰丹总人口的 1%（Pue, Ong & Loo, 2019）。吉兰丹土生华人所说的闽南话已经克里奥耳语化，含有大量泰语和马来语的借词（Kershaw, 1981），与主流闽南话差异很大，甚至不能通话（Teo, 2003）。除了语调受到马来语影响之外，吉兰丹福建话的语序也深受马来语影响（Pue, Ong & Loo, 2019），例如“外人”是 lang gua（马来语是 orang luar），chu kapong（甘榜屋）、sedak ciak（好吃）。

而华人移居马六甲大概在 15 世纪。当时的男性华人移民与当地土著妇女结婚，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族群，并拥有自己的语言，即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Tan, 2021）。从语言学角度看，峇峇马来语是一种混合语，即克里奥耳语（creole）。它作为马来语的一种变体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的峇峇社群中使用（Shellabear, 1913）。其词汇主要来自马来语，而语法则受到闽南话等方言的影响（Pakir, 1986, Thurgood, 1998, Aye 2006, Lee, 2014）。

随着峇峇娘惹社群的衰退，峇峇马来语也式微了。如今的马六甲也很难听到峇峇马来语，不过在一些娘惹餐厅和峇峇娘惹博物馆还能看到峇峇马来语（Wang et al, 2023）。例如图一是马六甲一家娘惹餐厅

的招牌，kocik 一词便是峇峇马来语，意思是“小姑”。这个词是闽南话 ko（姑）与马来语 cik（小）的合体，采用马来语的语序，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

图一：马六甲娘惹餐厅招牌



（二）马来西亚华语

华语经过本土化的发展，逐渐形成马来西亚华语，是全球华语重要的地域变体（王晓梅、周清海，2022）。我们基于多年的研究，提出“古-方-普-外”的分析框架（王晓梅，2019），用以分析马来西亚华语的特点，即马来西亚华语的词汇、语法、语音受到闽粤方言、英语、马来语的影响，保留了一些近代汉语、早期国语的词汇与语法特点，不过其核心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以词汇为例，马来西亚华语中既有来自南方方言的词汇，也有来自英语、马来语与早期国语的词汇（王晓梅等，2022），呈现出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举例如下：

茶乌：不加牛奶的红茶。（闽南话⁹）

受落：被接受，被接纳，受欢迎。（粤语）

固本：coupon 的音译，票证，赠券或者优惠券。（英语）

班顿：pantun 的音译，一种马来歌谣。（马来语）

同僚：同事。（早期国语）

五、中文传播的新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马来西亚的中文传播出现了一些新趋势。首先是 2009 年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正式拉开中国在马来西亚推广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序幕。紧接着世纪大学学院孔子学院 2015 年揭牌；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 2018 年成立；2019 年沙巴大学孔子学院创建；2020 年砂拉越科技大学孔子学院成为马来西亚第五所孔子学院。另外，2018 年马六甲培风中学孔子课堂揭牌，面向中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今年 2024 年，拉曼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成为马来西亚第 7 所孔子学院/课堂。马来西亚的孔子学院多设立在国立大学，教学对象基本以马来人、印度人为主，为传播中文贡献了力量。

马来西亚的中文传播的另一新趋势是非华裔入读华文小学的比例日益增加。2010 年非华裔学生占华小学生人数的 11.84%，2020 年非华裔学生的比例提高到 19.75%。（《南洋商报》，2021.3.23）。众所周知，华文小学的课程是为以华语为第一语言的学童设计的，其教学媒介语也是华语。因此，非华裔入读华文小学无疑为华小的教学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最近在雪邦沙叻觉侨学校的调查发现，该校的非华裔生从 2007 年开始逐年增加，目前华裔生只占两成（表三），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翻译等方法改善教学效果（王晓梅、梁小柔，2024）。觉侨学校并不是特例，东马一些华文小学也面对 80% 的学生是非华裔的情况。根据调查，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入华小就读主要是出于华语的经

9 括号内为该词汇所来自的语言或方言。

济价值以及孩子未来的职业前景 (Heng, Neo & Chan, 2021)。这也说明华文小学除了肩负传承华语与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之外, 也开始承担向非华裔学生传播华语的责任。同时, 新情况的出现为华文小学的教学也带来了挑战, 如教师缺乏相关的二语教学的训练、华文课本并非针对非华裔生编纂等 (Yeoh & Chew, 2024)。因此, 华文小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表三：觉侨学校学生人数的历年变化 (1979–2022)

	1979	1983	1993	2007	2010	2011	2014	2016	2019	2022
总数	259	243	228	214	200	200	169	165	128	102
非华裔	/	/	马来 3 印度 3	28	49	61	71	82	80	81

六、结语

中文在马来西亚传播的历史悠久, 若从 15 世纪算起, 已有六百年历史。早期的南方方言落地之后, 除了自身的演变以及与马来语等当地语言接触外, 方言之间也随着华人人口的杂居与交融而进行社会语言的重整 (Wang, 2010)。弱势方言衰退, 强势方言占优。人口占少数的方言群发生了语言转用现象, 家庭用语转向强势方言或华语。此外, 我们也观察到微观层面的方言拉平与混合现象 (Wang & Yeoh, 2020)。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华语在 20 世纪初传播到南洋以来, 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马来西亚华语的特点反映了其所处的多元语言环境, 与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在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传播主要依赖华文学校、华文媒体以及华人社团, 新时代又增添了虚拟空间的传播路径, 以及跨国的语言传播规划, 如孔子学院的设立等。

中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承与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在华人社会展开, 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 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的需求日增。华文学校除了母语教育的功能外, 增添了二语教育的新功能。由此, “三教问题”即教

材、教学、教师的不足即刻浮现。挑战即机遇，中文传播的新趋势正是华社整合资源、不断创新的历史机遇。目前马来西亚七所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或许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发挥作用，与华文学校携手做好中文传播的工作，互利共赢，谱写中文传播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陈绿漪 (1984): 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 林水椽、罗静山 (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 郭熙、雷朔 2022 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研究领域拓展, 《语言文字应用》, 第 2 期。
- 廖文辉 (2018): 《马来西亚史》。双溪毛糯: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潘碧丝 (2007): 《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及其协调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邵宜、冼伟国 (2004): 吉隆坡现代粤语阳上变阴去现象解因, 《广州大学学报》, 第 10 期。
- 王晓梅 (2006): 马来西亚华语与方言的竞争, 谭慧敏 (主编) 《汉语文走向世界》, 163-183。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
- 王晓梅 (2019): 古、方、普、外——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 *Global Chinese* (《全球华语》), 第 1 期。
- 王晓梅 (2023): 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研究历史分期与特点分析, 《世界华文教学》, 第 11 辑。
- 王晓梅、周清海 (2022): 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考察——以《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为例, 《全球华语》, (1), 127-141。
- 王晓梅、庄晓龄、汤志祥 (2022): 《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吉隆坡: 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
- 王晓梅、梁小柔 (2024): 马来西亚雪州沙叻新村觉侨学校的传承与变革。《丝绸之路》, 394(01):126-134。
- 翁慧珊 (2014): 试论马来西亚粤语声调简化的原因, 《文教资料》, 第 10 期。
- 徐威雄 (2012):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到 1919 年,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15 期。
- 徐威雄 (2020): 战前马新华语的推广与传播, 《全球华语》, 第 6 卷第 1 期。
- 徐祯 (2018): 马来西亚华语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历时共变, 《文化软实力研究》, 第 1 期。
- 钟临杰 (1998): 西马华族人口变迁, 林水豪等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197-134。吉隆坡: 中华大会堂。
- Aye K. K. (2006): *Bazaar Malay: History, grammar and contact*. Unpublished PhD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Chong Siew Ling (2004): Origins of Chinese dialects. Asmah Haji Oma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50-51.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 Cooper R. L. (1982):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pread. In Cooper R. L. (ed.) *Language spre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5-36.
- Heng Buai Chin, Neo Yee Feng & Chan Jie Yan (2021): Investigating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doption among the Malay community in Malaysia. *ESTEE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5(2), 151-264.
- Kershaw R. (1981): Towards a theory of peranakan Chinese identity in an outpost of Thai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9, 74-106.
- Lee H. Y. Nala (2014): *A grammar of Baba Malay with sociophonetic consider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 Pakir A. (1986):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 Pue G. H., Ong P. L. & Loo H. C. (2019): Kelantan peranakan Chinese language and marker of group identity. *Gema online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19(2), 33-51.
- Shellabear W. G. (1913):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in *Journal of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5, 49-63.
- Tan Chee-Beng (2021): *The Baba of Melaka*.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Teo K. S. (2003): *The peranakan Chinese of Kelantan: A study of the cultur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of an assimilated group in Malaysia*.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 Thurgood E. A. (1998): A description on nineteenth century Baba Malay: A Malay variety influenced by language shift,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 Wang Xiaomei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uala Lumpur.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5):479-489.
- Wang Xiaomei (2012): 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Wang Xiaomei and Yeoh Yin Yin (2020): The restructuring of a speech community on a foreign land: The Tianjiners in Sabah, Malaysi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0.1832100>.
- Wang Xiaomei, Koh C. W., Choo W. Y. & Leong S. Y. (2023): The revival of Baba culture through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Malacca, Malaysi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3.2230179>.
- Yeoh, Yin Yin & Chew, Fong Peng (2024):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mong Non-Chinese Pupils in National-Type Chinese Schools (SJKC)". In Ting, Helen Mu Hung (ed). *Mother Tongue-Base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and Emerging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Malaysia*, Bangi: UKM Press, 156-173.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Chinese in Malaysia

WANG, Xiaomei

Abstract

Chinese was spread to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Fujian, Guangdong and other places. It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dialect inheritance stage; 2) dialect-based inheritance stage with Mandarin as the auxiliary; 3) Mandarin-based inheritance stage with dialect as the auxiliary. The inheritance path of Chinese is different in each stage. In the first stage, the dialect period mainly relied on family, associations, private schools, etc.; in the second stage, new schools, Chinese newspapers, etc. became emerging inheritance paths; in the third stage, in addition to inheritance paths such as Chinese schools, Chinese media,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has not only been maintained in Malaysia, but also develop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early period, dialects (especially Minnan dialect) came into contact with Malay, resulting in mixed languages such as Baba Malay, Penang Hokkien, Kelantan Hokkien, etc.; after localization, Mandarin gradually formed Malaysian Mandari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nese variants in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grammar, etc.,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variant of global Chinese. With the opening of Chinese classes in national schools, non-Chinese students attending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Malaysia, the spread of Chinese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The spread of Chinese to more non-Chinese people has formed two routes of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Chinese in Malaysia, making it unique in the world.

Keywords: Inheritance of Chinese, Inheritance path,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Malaysian Chinese